

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（續完）

費 雲 文

抗戰勝利，維護東南大局

勝利來到，共匪公開不聽中央命令，乘機擴大佔領地域；並且想聯合偽軍，佔有東南，迫使

政府無法還都，當時情勢相當複雜；幸經戴先生的謀劃應付，才克制了共匪的奸謀，掌握了東南的局勢。（詳見拙著戴先生與中美合作所）當時付予忠義救國軍的新任務是：



忠救軍改編為交警總隊後，遠抵山海關，圖為部份官長在「天下第一關」前留影。

（一）淞滬指揮部的部隊，警戒上海近郊和浦東，堵共軍向上海郊區滲入。

（二）第一、二縱隊，仍遵照第三戰區長官部的命令，防守天目山區，並監視浙西殘留共軍的活動。

（三）京滬行動總隊，負責維護京滬鐵路線的交通，防止共軍破壞。

（四）滬杭行動總隊，負責維護滬杭鐵路的交通，防止共軍破壞。

（五）第三縱隊向富陽、杭州前進，為「中美所」直屬第一支隊の後繼兵力，維護杭州和滬杭之間的安全。

戴先生此項部署報奉軍委會核准，並知照三戰區後，為了避免共黨份子乘機造謠中傷，啓人誤會，乃于八月廿三日通電忠救軍全體將士：

「……諸同志應各就工作崗位，協應友軍，愛護民衆，共維地方之治安，嚴防奸匪之進襲。凡偽軍部隊，能服從中央命令，堅決抗拒奸匪者；本局均可查明其實力，呈准中央，給予相當名義，聯絡一氣，團結一致，監視敵軍行動，制止奸匪之活動。絕不可弱肉強食，循環報應，形成對立，自亂步驟也。萬一因給養不繼，必需向地方暫行籌備者，亦必商同地方士紳，據實際最低限度之需要，暫行借貸，絕不准脅迫勒索；如有故



抗戰勝利後，忠義救國軍奉命改編為交通警察總隊，戴笠將軍與全軍團長以上官長，於蘇州中山堂前排起第四人鮑步超，第五人尚望，第六人王春暉，第七人，戴笠，第八人馬志超，第十人郭履洲。

違，一經查明，或有民衆告發，定必嚴懲不貸。」本文中提到的忠救軍向地方暫借給養的事，這在當時，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因爲，在敵後發展游擊，全靠羣衆支持；羣衆所講求的是順逆，所希望的是名義。如果僅爲敵我之爭，壁壘分明，還容易辦；但當時除了日敵以外，還有依靠日敵的偽軍，還有表面上是抗日友軍，而暗蓄敵意的共軍。因此，爭取和掌握羣衆，除了政治號召以外，必需隨時隨地接受効順，予以收編，給予番號。天下未定，事機稍縱即逝；無法每一件事都事先呈准，每一個隊員都先有編制員額和薪餉服裝。如太刻板拘執，反而予共軍可乘之機。（共軍曾有『蔣家不要我毛家要，十萬塊錢報個到』的口號，用以爭取偽軍和地方團隊、雜牌武力。）所以，有些事，必需當機立斷，先就地設法解決，然後再呈報軍委會。戴先生惟恐人多複雜，或有少數人言辭態度啓人誤會，遭人反感，所以通電警戒。

忠救軍發展到勝利前後，人多勢大；而抗戰期間歷年損耗補充，組成份子的智識程度也參差不齊；一人擾民，難免影響軍譽，何況一般人對游擊隊的看法本難分辨優劣？久戰師老，須防驕縱疲弊，何況共匪的蓄意破壞中傷？因此，戴先生對忠義救國軍的軍紀，非常重視，經常利用出巡機會，親臨戰地視察，並一再手令教諭，語重心長，赤誠感人。卅四年一月，即曾手令全軍同志說：

「志超兄並轉
本軍諸同志鈞鑒：

笠因在渝事多，致不能多赴前方，與我忠救軍全體同志見面商談，但方寸之間，無時不想念到本軍之一切也。

當此勝利在望，而吾人之工作倍形困難之時；吾人應如何上下團結，一德一心，加強組訓，整飭紀律；以求本軍力量之堅強，並與民衆密切合作，以打倒敵寇，剷除奸偽；此爲我全體同志急須切實檢討急起直追者也。故在當前情勢之下，本軍必須嚴密組織，着重訓練。在人事方面，必須注意戰功，注意其人之品德，而後注意其學識與能力。有功者必予升遷，必予獎勵；有罪者必予嚴懲，有過者必予訓戒。振作人心，鼓勵士氣。對經濟方面，在本軍今日之情形，節流重於開源，緊縮重於增加。對無用之組織，不必講求表面，必須實行緊縮；對無用之人員，應即詳行考核，切實予以裁汰。各國士兵之缺額，應多方設法補充，隨時隨地實施訓練

。對全體官兵之生活，應多發給實物，力求其營養之增進。而各級幹部，尤須涓滴歸公，力行節約；並須與士兵共甘苦。對眷屬隨身的官兵，應盡量裁遣；對在前方結婚之官兵，務必嚴行懲處，減少拖累，增加力量，此為本軍當前迫不及待急須切實解決之問題也。

姑息足以敗事，顧慮太多，亦足以敗事；萬希本軍各級幹部同志時刻念着領袖在八一三之後付與各人之使命。敵寇不除，是吾人之恥；如京滬克服，不是本軍之衝鋒陷陣，首先進入者，即是吾人之失職。吾人必無以對領袖與先烈。吾人欲達此目的，當然需要與盟友合作，當然需要運用一切力量。但吾人本身如不健強，如無力量；則合作與運用，均無補益也。

目下時機已迫，稍縱即逝；本軍實為東南抗戰之主力。吾人應以劍及履及之精神，爭取時間，爭取勝利。

凡參加本軍工作者，吾人終要求其能盡忠職守，勇敢善戰；即一士兵一伙伙，我各級幹部，亦須隨時注意考核，據實呈報總部，總部必須一面詳行註記，一面查明獎勵。至於擾民之事，應嚴格制止，澈底調查。擅取民物者與強姦婦女者及任意拉夫者，必須查明立即軍法從事；並須廣事宣傳。本軍如不能遵此意旨，切實做到，則革命之部隊，將為民衆必須打倒之對象矣。吾人有何力量可能達成殺敵除奸之任務乎？

笠因與我全體同志成敗與共，死生相同；因關係之密切，不得不掬誠以奉告。臨穎神馳，極望我全體官兵同志努力自愛，自強不息；以達成吾人神聖抗戰之使命。」

綜上所述，忠義救國軍不但是「聯日、不抗日」，而且是一支始終打擊日敵，愈戰愈強的勁旅；自民國卅二年接受中美合作的訓練與裝備後，已立於不敗之地，其戰鬥的性質，也已經由原來的游擊擴展為堂堂的陣地會戰了。日敵對之，如芒刺在背，既痛恨又畏懼，必欲去之而後快，幾次調動大軍，甚至由中將級軍官指揮；甚至已經投降在即，還要偷襲以洩憤；其因為忠救軍的牽制而感到的困擾，因為忠救軍的戰鬥，而受到的犧牲損失，都是相當重大的。

此外，日敵卵翼汪逆成立偽政權，原想藉其在國民黨的地位聲望，號召陷區民衆，形成一股足以與重慶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，達到他「以華制華」的目的。可是，由於軍統局在敵後的地下組織鋤奸行動的積極，尤其是忠義救國軍始終在京滬杭地區活動號召，發生了與地下組織相互策應的作用，發生了鼓舞陷區民士氣的作用，對猶疑徘徊的人們形成了一種嚇阻力量。所以，汪逆偽政權，始終無法形成巨大力量，更談不上與中央分庭抗禮了。

但中共的軍隊，却是專打國軍不打日敵，祇求壯大自己的匪軍。在江南，尤其視忠義救國軍為眼中釘，經常以武裝力量，對之明因暗襲，並且配合惡意的宣傳。當時潛伏在上海西南的「中美合作所」的美方情報人員詹恩上尉，見此情形

，感到事態嚴重，曾經向梅樂斯副主任提出報告說：

「在此地區所有效忠國家的中國部隊所進行的戰鬥，都是自衛性的。共軍很明顯的完全是侵略部隊，他們的活動，極大的搗亂了本單位的工作。」

共黨利用對日抗戰，專襲併地方團隊和力量較為單弱的國軍，壯大自己；一面配合宣傳攻勢，顛倒黑白，真可謂到處逢源，無往不利。尤其在山西、山東、蘇北、河北一帶，都已經控制了廣大的地區。惟有在江南京滬杭地區和浙皖邊境，因為遇到忠義救國軍，不但企圖失敗，而且蒙受很大損失。勝利前後，想聯絡偽軍，搶收京滬，又被戴先生運用「中美合作所」的關係和忠救軍的力量，着了先鞭；以致其陰謀無法實現。因此，痛恨忠義救國軍乃當然之事；現在竊據大陸，歪曲歷史，信口胡謔，痛詆忠救軍以稱意，原為其慣技。然而事隔卅年，還要拿來作重點宣傳，並且繼續加強，那是因為忠義救國軍的餘緒和留存的精神，一直在大陸上困擾着匪偽，至今為烈，使其感受威脅。

改編為交通警察，參加戡亂

抗戰時期，頗具規模的游擊部隊，除忠義救國軍以外，尚有一支「別動軍」。別動軍是由國軍各部隊挑選出來的敢死隊，本擬用為加強對日敵佔領城市的攻擊。因為當初的構想，是以第五縱隊的方式，身穿便衣，潛入城市之內，作為內應的，所以又叫「便衣混城隊」。軍委會交由戴

先生就軍統局同志中選派優秀幹部組成督練組，負責訓練指揮。民國卅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戴先生呈准軍委會，將便衣混城隊改編為別動軍，編成七個縱隊（相當於加強團）。民國卅二年，「中美合作所」成立以後，別動軍也是參加合作的單位之一，接受美式的訓練和裝備，經常在平漢路、粵漢路，以及湖南、兩廣一帶襲擊日敵，頗著事功。

另外，在後方還有一支組織龐大的交通巡察部隊，那是屬於軍委會的交通巡察處（包含原來財政部緝私署稅警部隊）有九個總隊（相當步兵團）的兵力。也和戴先生以及軍統局有深切的關係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戴先生鑑於匪患未已，交通安全頗為重要；乃呈准軍委會，將忠義救國軍、別動軍、交通巡察處，以及中美合作所編練的教導營，合併編為交通警察總局，總數六萬四千四百零二人，各重要道路，設有路警，並轄十八個總隊（加強團），負責全國鐵路、公路、航路治安的維護和礦區的警衛工作。吉章簡、馬志超先後任局長、馬志超、徐志道、吳志勛、尙望、郭履洲先後任副局長。

交通警察的基本任務，為護路護礦，裝備祇有輕便武器而無重武器，由於任務的關係，分佈全國。編訓未及一月，即因匪亂加劇而提先開入駐地服勤，而擴大警察行動為綏靖作戰，參與會戰；甚至担任大軍撤退的掩護任務。由於大部份成員，都受過戴雨農先生的精神鼓舞和感召薰陶，都具有革命主義的堅強信仰，所以組織強固，

團結一致。同時，雖然祇有輕武器裝備，但大多數成員曾受過新的美式技能訓練，都配備有美式新武器；所以戰力強勁，士氣高昂，是一支精銳的朝氣蓬勃的部隊，而且也是匪軍感到最難應付和最痛恨的部隊之一。

交警與匪軍作戰大小一千三百餘次，每次參加作戰的兵力，有小至一班者，最大達到六個總隊。作戰的時間，最少數小時，最多長達數月。總計傷亡失蹤的官兵達十餘萬人（包括不斷補充者在內），使匪軍蒙受的損失，也很嚴重。因為篇幅的關係，難以盡述，祇就戰況慘烈關係重大的戰役，和對當時局勢所發生的影響，對國家對領袖竭誠盡忠，所表現的奮鬥到底的精神，擇要敘述。

浴血苦戰，竭忠盡瘁

民國卅五年夏，共匪企圖威脅京滬，乃以陳匪毅率三個師自蘇北攻陷如皋，直指南通，我整編第廿六旅被圍於南通和如皋之間的白蒲，一時京滬震動。交警第七、第十一兩個總隊奉調蘇北，增援陸軍整編第十九師等部隊作戰，負責地區內主要交通線的維護。當以新銳之師，力戰向前，先解白蒲之圍，再協助友軍克復如皋，即担任城防。八月，担任如南公路（南通到如皋）的護路任務。匪軍乘交警部隊分散於公路的各據點之上，針對我無重武器無有利掩護地形的弱點，于廿一日，以三師之衆，採「阻援打點」的戰法，集中進攻丁堰、公家碼頭、林梓三個據點。我軍苦戰二日，傷亡達二千二百餘人，為成軍出

師以來，最先受到慘重犧牲的一役。但也使匪軍傷亡達四千人，攻勢頓挫。

在北方，八月上旬，賀龍匪部與土共及日軍高橋部隊約四萬人，進犯大同，連陷城郊各據點。我楚溪春部卅八師、騎五師、六師、保安總隊及挺進軍被圍困。駐防包頭交警十六總隊，奉令派第三大隊空運增援，自十七日起，至九月十七日，激戰一月；以精銳的裝備火力，作機動使用，多方援應，乘間逆襲，力阻匪軍人海攻勢；終於十七日發動果敢追擊，解大同之圍，使匪軍初嚐「以大吃小」和「人海戰術」竟仍失敗的苦果，是役該大隊，傷亡官兵一百五十四人。（約為全隊的四分之一）。大隊長朱廣鵬副大隊長景震泰，均蒙 蔣總統召見；朱晉少將，升第九總隊長，景晉上校，升十三總隊長。

在東北，民國卅六年六月上旬，林彪匪部四個縱隊，圍攻四平街。我七十一軍攻佔該地不久，戰力未復；各地友軍，距離較遠，應援不及。情勢相當危殆。當時，交警第十三、十四總隊正集結開原，改編為國軍一六九師（因戰力強勁，作戰有功，由東北長官呈准中央）奉命馳援。當由十四總隊鮑步超部在前，十三總隊在後，集中兵力，經紹皮屯猛攻四平東南的八棵樹和二七一高地匪軍陣地。此處為匪軍最重要最堅強的陣地，工事極多，且有坑道聯絡，匪軍派重兵駐守。仰攻、攻堅，當然很困難；但不攻要害則無法瓦解四平之圍。交警部隊勇赴艱鉅，逐堡突擊，逐壕攻殺，血戰五天；最後以十三總隊迂迴至敵後，兩面夾擊，卒將匪軍驅逐，克服八棵樹和二七

一高地，打開圍城的通路，啓導四平會戰大勝的契機。是役，傷亡官兵一千七百餘人；大隊長賈維錄、姜益三、副大隊長徐壯傑、機槍三隊隊長周瑞等因爲負傷不退，與指揮官鮑步超同獲政府頒發勳獎。

在山東，膠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對峙，形成渤海的海門戶，爲地略的要衝。陳匪毅即據此以生根發展，膠濟鐵路遂成爲其破壞的主要目標。民國卅五年夏，中央爲打通膠濟鐵路會調交警第一、三、五、十、十二、十五等六個總隊，由副總局長馬志超率領，開往青島，配合國軍作戰，經數月的苦戰，達成任務；不但使膠濟路暢通無阻，而且也分隔匪軍，造成區分擊滅的有利態勢。後來，局勢逆轉，交警部隊爲了維護此一鐵路的交通，付出了慘烈的代價。

民國卅七年一月，交警第一總隊黃錫疇部任博山的守備，二月下旬，陳匪毅以四個縱隊集中濟南四週；總隊乃奉命增防濟南。三月一日行抵淄川，淄川被圍，正在作戰；乃加入戰鬥，協同防軍，擊退犯匪，旋奉命固守淄川，由專署保安司令統一指揮。當時防守淄川的另有國軍第一零二團；另在附近的周村，爲國軍卅二師。自二日至九日，匪軍一再增援，已將周村的卅二師和淄川的一零二團擊潰。十日，突入淄川城內；該總隊在孤立無援的逆境下，奮勇抵抗，逐屋爭奪，不斷逆襲；彈盡援絕，猶各自爲戰，不稍餒屈。並且堅拒匪軍的勸降，大呼：「戴先生部下沒有投降的，中美班學生沒有繳械的」，死傷達二千八百九十四人。但也吸引大量匪軍，使其蒙受

重大損害，而延緩了對濟南的用兵時間。

在冀東，交警部隊負責北寧鐵路的交通，開灤煤礦的安全，以及昌黎城防。爲便於統一指揮，成立支隊司令部（旅級指揮部）於昌黎，指揮第五、第八兩個總隊，迭次擊退匪軍的襲擾，確保鐵道的暢通。民國卅七年六月，匪爲呼應東北的軍事行動，動員聶榮臻、李運昌部共五個縱隊，約四萬之衆，配合土共，于廿三日夜向鐵道十個車站同時進攻，迫我軍各自爲戰，無法相互援應。我戍守鐵道的第五總隊，血戰至廿四日十四時，有七個車站全軍覆沒；僅留守營、安山、朱各庄三個站及灤河大橋仍在苦撐中。湯毅生司令乃急由昌黎分兵往援；以致昌黎城兵力單弱。匪軍遂以兩個縱隊之衆，大舉攻城。因實力過於懸殊，戰至廿五日十一時，彈盡援絕，城陷，湯司令負傷被俘不屈，于四十二年六月，從容就義，官兵死傷達四千五百人，幾全軍覆沒，孤軍奮鬥爲犧牲較大的一役。

在豫中，民國卅七年六月中原會戰，廿八日起，陳匪毅以十個縱隊之衆，與我黃伯韜兵團在睢縣以北的鐵佛寺、龍王廟之線激戰；並以圍點打援的慣技，阻撓來援的第五軍於東卅里舖，形勢危殆。時我交警第二總隊正守備隴海鐵路的朱集和商邱，卅日，奉令除留置一個中隊於馬牧集外，其餘部隊，配以榴砲一連，戰車一排，即刻以汽車運輸，至寧陵，向睢縣攻擊，以策應黃兵團的作戰。總隊遵限出發，沿途驅散散匪，擊潰匪魏鳳樓部，進佔寧陵。七月一日繼續西進，擊潰匪軍，進佔宋莊，楊驛舖；奉黃兵團令進攻柴砦

、蔣莊，掩護兵團的側翼。二日至七日，在柴砦附近吸引匪的第一縱隊第二師，和兩廣縱隊的主力，連日激戰，總隊以任務重要，莫不鼓舞奮發，以優勢火力，猛擊匪寇，故死傷匪軍達數千人，匪勢大挫，總隊也傷亡官兵五百餘人。八日，奉令沿商寧公路排除障礙，掩護黃兵團東進，以迄會戰結束。總隊長張績武因功獲頒勳章，並蒙總統召見，核以師長任用。徐州勦總及第六縱區，以總隊的實力堅強，戰績輝煌，紛紛要求將其擴編爲旅或師。

臨危受命，奮鬥到底。

戡亂戰爭，自東北及徐蚌會戰失敗後，大局逆轉，士無鬥志；民國卅八年初，總統引退，李宗仁侈談和平，大眾解體。四月，匪軍順利渡江，進攻上海。

當時，交警局長馬志超指揮集中上海的交警第二、五、六、十一、十二、十八等六個總隊，第十五總隊的第一大隊，以及上海市警第一、二總隊，編成上海市中心區守備兵團，佔領市區堅固建築物，維持治安，鎮壓暴動，策應郊區國軍作戰；如匪軍突入市內，則由交警擔任作戰。旋因馬局長奉令率局遷粵，乃由副局長郭履洲負責指揮。

五月中旬，匪軍進犯浦東，國軍作戰不利，乃抽調防守滬南的七十五軍的三個師及所配屬的砲兵團前往增援。該軍原防守的滬南陣地，交由交警部隊接管。當時，交警第二總隊已先調赴浦東，配屬青年軍；乃以五個總隊（共十八個大隊）

及一個大隊接替防務，担任原來廿六個營陣地的守備，不但兵力單弱，而且無砲火支援。當匪軍攻擊局部陣地時，尚可抽調轉用；一旦全面進攻，則處處薄弱，捉襟見肘。交警部隊受命於危難之際，毅然作積極準備。

廿一日開始，匪軍以三個軍的壓倒優勢兵力，猛攻我陣地，並以密集砲火，作地毯式轟擊。我軍浴血抵抗，左支右拙，寸土力爭，前仆後繼，惟以所用美式槍枝的彈藥，上海後勤部無法供應，以致在傷亡過半的困境之下，又有彈盡援絕的情況；但仍堅守最後陣地至廿四日，儘量延遲匪軍進入市區。

廿四日，浦東已陷落，吳淞告急，交警兵團奉命轉守蘇州河北岸，阻止匪軍渡河，掩護國軍撤退；激戰至廿六日，傷亡慘重，仍以血肉長城，阻匪前進。匪派代表王振寰至北火車站，向第六、第十八總隊勸降；總隊以匪我不並存，毅然開槍，將王匪擊傷。戰至廿七日，完成任務，全部壯烈成仁。

當交警參加上海保衛戰時，誓與上海共存亡，所以未準備撤走的船隻，也未作撤退的計劃，傷亡達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人。匪軍進入上海後，交警的殘存部隊，化整為零，潛入地下，從事反共游擊活動。

匪軍攻陷上海後，繼續向南進攻，民國卅八年五月，進入福建。當地土共，乘機蠢動，破壞公路，襲擊駐軍，福建幾成孤城。幸交警第三旅（轄第一、三、八總隊）、第四旅（轄第七、十五、十六總隊）陸續到達，在副總局長尚望指揮

下，負責防守福州，民心士氣才漸趨穩定。

七月一日，奉福州綏署命令，打通福廈公路，肅清土共，確保交通安全。乃以第三旅楊遇春部負責惠安到廈門之間維護清剿的任務，該旅第八總隊楊卓夫部，立即殲滅崇武附近的土共；第四旅鮑步超部負責惠安到福州之間的維護清剿任務，該旅第七總隊翁汝樑部，曾協助國軍沈向奎部清剿永泰縣的大渡口土共老巢，保持福州與廈門之間的安全暢通。

八月初，國軍撤守福州，退守金廈。廿四日，交警部隊奉命于晉江、青陽、安海、水頭一帶節節抗敵，遲滯匪軍前進，掩護國軍在金廈地區的集結與部署；八月底以前，不得撤至蓮河、馬巷以南地區。當決定採取持久作戰，自卅一日起，與進攻的匪廿八軍激戰，反覆衝殺，肉搏力拚，使匪寸步難前；尤以水頭、安海之戰，前途大敵，後臨大海，而仍奮厲無前，不稍搖動。匪軍遇此強敵，殊感憤恨，曾以廣播示威：

「我軍行至安海附近，惟遇鮑匪部隊，異常頑固，節節向我滯阻，他們處於孤軍背海的境地，仍執迷不悟，企圖掙扎，我們必須把他們徹底掃盪得乾乾淨淨……」

此戰我傷亡五百十六人，遲滯匪軍進攻廈門時間達廿餘天；使金廈國軍有充份時間，從容準備，而且也激發友軍與匪作戰的信心。第三、四旅完成任務後，奉調廣東潮汕待命，曾協助第十二兵團清剿土共劉舉生部，並掩護十二兵團全部轉進金門；然後再參加古寧頭戰役。後來，因為表現卓越，奉令改編為第十八軍的第四十三師。

浙東方面，交警第九總隊，本來于卅八年三月駐在奉化溪口，担任 蔣總統的警衛。後來局勢變化，上海淪陷，乃轉駐三門灣的南田。九月，奉命駐守桃花島，作登步島八十九軍的正面掩護。當以大約三個大隊的兵力，防守東西廿五華里，南北十六華里的廣大山地；交通不便，工材徵集困難，而且也無重武器掩護。以之對付匪軍的猛烈砲火，人海攻勢，實有力不從心之苦。但總隊毫不氣餒，仍選擇形勢要地，作重點配備，努力殲匪，不以孤島援絕而稍却顧。自十月十八日起，力戰至廿二日，斃傷匪軍達二千人；總隊除一百九十三人突圍生還外，餘一千三百餘人，全部壯烈成仁。

當卅八年五月上海保衛戰劇烈進行時，交警局在四川積極擴充整訓部隊，準備將來在大西南與共匪作另一回合的戰鬥。當成立第一旅于重慶，另編成新的第二、五、十二、十三總隊，除以新第二總隊駐巴縣外，其餘集中重慶。

十月，匪軍大舉入川。時， 蔣總統坐鎮重慶，該旅奉命抽調九個分隊，在廖宗澤、周迅予、唐伯岳、高凌漢指導下，掩護保密局的工作人員，破壞軍事工廠，免資匪用。總局長馬志超，則親率十二、十三兩個總隊的主力，駐守機場附近，担任 總統的警衛。卅日， 總統離渝飛往成都；該旅分途向成都前進，原擬轉赴西康，參加胡宗南將軍的大軍，建立西南游擊基地。但沿途迭遭叛軍阻撓，無法安全到達；於是乃化整為零，分別在不同地區聯絡地方反共人士，建立游擊基地，與匪週旋到底。

深處敵後，蓬勃游擊活動

大陸淪陷，國軍有組織的抵抗業已中止，若干意志不堅的部隊緬顏投匪，甚至為虎作倀，助紂為虐。不甘共匪奴役的人們，紛紛組織反共武力，以為抵抗。留置大陸的交警部隊和保密局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乃因勢利導，力為倡率；並且與來台建立反共基地的中央政府取得連絡。一時聲勢大振，義旗所指，遍及十六省；當卅九年極盛時期，受保密局掌握指揮的游擊單位共一百卅七個，總兵力達一百卅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九人；其中經常可通電訊，並且有戰果的，有十四個單位；對共匪影響最大的為湘西的王春暉、川康的周迅予、川滇的田動雲、太湖的金家讓，都是戴雨農先生的部屬，也都是以交警部隊為骨幹的。

王春暉本是忠義救國軍的副總指揮，大陸淪陷前，任交警第二旅旅長，指揮第十五、十七兩個總隊，駐衡陽，負責湘桂鐵路交通維護。共匪渡江後，局勢逆轉；該旅陸續收容各方後撤的交警路警和部隊，新編五個總隊（連前共七個總隊），並設員警訓練班，積極整頓。廣州棄守後，毅然號召忠義，游擊敵後；率部入湘西，在臨武、藍山、嘉禾一帶建立反共政權與游擊基地，委派各縣縣長，策勵反共志士，人槍達三萬五千。因其迭次襲擊匪軍，破壞交通；使匪對雷州半島和西南用兵，受到牽制。匪偽視為心腹大患，乃于卅八年十二月，以「四野」兩個軍精兵，四面圍攻基地。王率眾奮力反擊，殲匪極多；激戰一月，因彈盡援絕，乃化整為零，轉入他處，繼

續活動，王受重傷，自殺未果，被俘不屈；于卅九年四月八日在衡陽「公審大會」上，痛斥共匪禍國，並稱：「我王春暉雖被殺，但尚有千千萬萬王春暉，決殺不盡」。旋即高呼口號，慷慨就義。

田動雲，本來是軍統局同志，曾任站長，卅八年十月，任交警滇越區警務處長，駐守滇省。大陸淪陷後，毅然率路警赴川南的慶符、琪縣一帶，建立基地，號召忠義，策動匪偽反正，達六萬七千五百之眾，分佈於川南、滇東一帶，與匪作戰多次，聲勢浩大；曾奉 蔣總統于卅九年五月明令嘉勉，所部士氣，益為振奮。共匪對他，有如芒刺在背；乃於是年八月，調「二野」兩個軍，大舉圍犯。當時，田部義軍士氣昂揚，但彈藥缺乏，不能局守一隅。田面臨危局，從容鎮定，亟召所部說：「漢賊不兩立，吾人必抱馬革裹屍的決心，擊敗匪軍，直搗重慶，收復西南，方不負國家教養之恩」。隨即親歷前線，與共匪作殊死戰，激戰月餘，斃匪甚眾。惟匪一再增援，而義軍彈藥有限，犧牲也大。為免同歸於盡，當令一部突圍，另立基地，徐圖發展；一面親率敢死隊衝入匪陣，掩護突圍，斃匪百餘人，終於壯烈成仁。

周迅予，本來是忠義救國軍的處長，大陸淪陷前，任瀘州警備司令，應召赴重慶指導破壞軍事設施，免資匪用，西南陷匪後，乃率部份交警部隊為骨幹，號召忠義，組成川康邊區人民反共突擊軍，在松潘附近與不甘附逆的川軍副軍長傅秉勛部會合，以黑水為基地，從事游擊作戰；四

十一年接獲政府自台灣前往空投的人員與物資補給，聲勢益振。青海、甘肅、西康一帶的回、藏同胞，紛紛響應，成立了十個游擊縱隊，有眾四萬人；南起川西茂縣，北迄青海同德，縱長五百六十公里，東臨隴東，西達青海果洛區，橫貫四百公里，均在控制之中，建立無線電台廿三座之多。共匪驚恐難安，于同年四月起，以步騎數萬之眾，配合兩個「公安師」，並調空軍助戰，持續進犯。義軍奮勇抵抗，反覆逆襲，斃匪極多。四十二年五月，周輕裝簡從，奔馳於我軍與匪軍犬牙交錯地帶，指揮所部，相機突擊，不幸被匪所乘，乃投河成仁。黑水基地雖告放棄，但所部志士，仍繼續活動於大西南一帶。四十七年，聯絡康巴民族，發動抗暴，終致引起大規模的康藏反共抗暴運動。

忠義精神，影響深遠

在江南，大陸淪陷後，原參加上海保衛戰未及撤退轉入地下的交警部隊，以及過去戴雨農的部屬，忠義救國軍的老人，組成江南人民反共突擊軍的游擊部隊，以太湖地區為中心，活動於京滬杭一帶。由於過去忠義救國軍深入民間的深厚關係，發展極為蓬勃；共匪雖然一再以武力、鬥爭等方法予以「掃盪」、摧毀，但始終無法根除。尤其在反共的思想意識上，戴雨農先生當年所提倡的忠義精神，始終像一團聖火，燃燒在崇尚正義，愛好自由人們的心田上，給他們勇氣，給他們信心；始終像一把利劍，砍中共匪的要害，使其感受長期的困擾和威脅。此所以六十二的今

天，共匪還要以「樣版戲」來痛詆忠義救國軍。戴雨農先生鼓勵同志發揮忠義精神，不僅是言教，而且也以身教，而且也主動的解除同志本身的痛苦，主動的識拔擢用各種人才，不以直諫為悔，不以瑕疵擯棄，完全以忠義血忱和同志共處。常常藉各種機會鼓勵同志，冒險犯難，以無名英雄自甘；每發人所不能發的精闢言論。當民國卅二年，戴先生為軍統局受謗頗甚，甚至謠傳戴某即將垮台的時候；他曾對同志懇切的表示：

「中國革命是否需要吾人之工作，是否由我戴某終身為之；此非余個人所應爭持者，而一切聽命 領袖。在 領袖未令余不做以前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余必始終如一，貫徹到底，生死成敗，在所不計；祇求無愧領袖，無愧革命，無愧國家。十載以來，吾人原無好環境；除 領袖對余之督責、訓勉、愛護、期望之外，幾無時不在反革命勢力之層層包圍及威脅利誘中掙扎奮鬥，並求工作之發展。因此，余只要求我同志絕對忠於領袖、忠於革命、忠於國家。古云：『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』，又云：『持其志毋暴其氣』，余嘗以頭可殺而志不可移自勉。須知吾人要在最惡劣之環境中，始可有最大成就，如無艱難困苦之磨練，即無從見盤根錯節；經不起風浪，即不能作中流砥柱；故余以為青年人環境太好則為壞運氣，環境壞始為好運氣。吾人之組織乃革命團體，一切為國家，一切聽命 領袖；而非政治團體，自有其政治主張。在此前提之下，吾

人獻身革命，為求主義之實行，而非戀棧於官職；革命成功後，即做一太平百姓，亦心安理得。因此，目前最要者為修身以進德，以求不愧天地父母所生，不負 領袖與國家之愛護與期望而已」。

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，戴先生利用慶祝中國國民黨成立五十週年，紀念 國父誕辰的機會，勉勵同志做無名英雄，創造光榮歷史，他說：

「余讀本黨歷史，深感革命之可以成功，實由革命先烈之忠勇奮發，同心協力；秉承 國父意志，為國為民，拋頭顱洒熱血之結果。然僅憑此已知名姓之先烈仍不足寫下本黨五十年光榮歷史；而必須有廣大之無名無姓之羣眾為革命而犧牲，始克完成。故吾人今天紀念 國父與有名有姓之先烈固屬重要，但紀念其他無名無姓之同志同胞，更具深刻意義。一部史書，乃由白紙黑字合成者，吾人在歷史所佔之地位不是黑字，而是寫黑字之白紙。此歷史必須具備之白紙，即吾人之清白家風；而吾人即其他無名無姓而為革命犧牲之志士。然吾人必須誓作歷史之白紙——無名英雄，一切努力，必須出發於革命之義務感，毫無個人之企求，以繼承 國父與革命先烈之遺志，續寫今後之光榮歷史」。

戴先生以做歷史的白紙勉勵同志，並非徒托空言；他自己以身作則，從不矜伐自己的功績，從不畏避任何艱難複雜的事務，勞怨不辭，生死

不渝；而以忘我為「清白家風」之倡率，所以能蔚為團隊的風尚，歷久彌堅！

當民國廿六年倡議組織別動隊，以至後來的忠義救國軍、交警的路警和部隊，由萬人發展為十萬之眾，一脈相承，始終在艱危的環境中與不同的強敵奮鬥；愈挫愈奮，前後已歷廿六年，莫不勇毅英發，鞠躬盡瘁，絕少動搖變節，敷衍退縮之事，甚至在大陸淪陷廿四年後的今天，仍在敵後繼續活動，奮鬥到底；其所秉持的賴以維繫的一貫的精神，就是戴先生的忠義精神，就是軍統局的「清白家風」的團隊精神。

目前，時事日艱，縷述當年往事，回憶戴先生的英姿壯志，一片忠義赤忱，影響如此深遠。而哲人已逝，不禁無限懷念，也無限感傷！同時更對忠義救國軍和交警總局的革命烈士，表示無限的崇敬。對仍在敵後艱苦奮鬥的同志，予以虔誠的祝福！

中外文庫之七：

懷鄉集 葉蟬貞著

再版出書 定價拾捌元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

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